

从教化到通识:中国史学传统功能的现代转换

曾育荣

摘要: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社会功能的突出表征。但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中,史学经世的含义存在显著的时代差异。传统史学的“资治”宗旨,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以鉴戒和褒贬为内核的教化功能满足社会上层的政治诉求。而受近代以来外侮日近、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史学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传统的教化主题遂让位于救亡图存、富国自强的目标,并由此而发展为强调自主独立的民族主义,从而更多地与普通社会民众的现实人生产生关联。尤其是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伴随中国化进程在“五四”之后的加深,逐步形成了完整框架和严密体系,其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同样体现出民族主义的意蕴。从施用于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考察,在传统至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中国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清晰地显现出向通识性演变的趋势,其具体表现为史学对于社会个体层面的道德品性提升、家国情怀培养、民族信仰树立和全球史观形成等方面影响的日渐扩大和深入,时至今日又愈益强化,并富含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中国史学;经世致用;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

史学功能是史学生命力的根源所系,也是考察史学的根本性问题。作为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经世致用功能,“从大处、深处、远处去看……有两个境界,一个是淑世的境界,一个是致用的境界。两个境界配合起来,能使历史的用处,无尽无穷”^①,但“用处”的具体内涵、服务对象与表现方式却并非一成不变。通观中国史学的过往轨迹,就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论,烈度最大的嬗变莫过于从传统至近现代的转折。故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探讨史学的近现代转型论题时,屡屡涉及中国史学传统功能变异出新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仅以通贯性宏观解构的成果而论,学人更多着眼于比较历时态的新旧更迭中史学功能指向、尺度、形式及性质的前后差异,认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书写主体,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承担道德裁判任务,具有“鉴戒”“资治”“垂训”“教化”功能,是服务于当权者的统治工具,属于政治史学范畴,或可称之为“国家史学”“政府史学”;而近现代史学因发端于民族危机之际,以抵御外侮、自存图强为使命,强调立足本土特色、贴近时代脉搏、解决现实问题、拯救国家命运、谋求民众福祉,研究范围则日益拓展至民生日用领域,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色,体现出社会化和大众化色彩。上述认识清晰揭示出中国史学传统功能自晚清以降发生的重大方向性调整及其变迁趋势,是理解和把握近现代史学转型的重要理论资源,价值不容低估。

不过,倘若延续以上思路做进一步引申便不难发现,由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史学被赋予了深

收稿日期:2020-05-29

作者简介:曾育荣,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研究。

①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8页。

厚的民族主义底蕴,摆脱了传统史学的单一政治取向而面向更广大的社会群体,从而演变为社会个体提升道德品性、培养家国情怀、树立民族信仰和形成全球史观的首要资源,故其致用功能更为丰富和多元。依此而论,与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相对应,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社会功能实际上具有鲜明的通识性特征。质言之,从知识接受与价值观改造的角度考察,在中国社会由传统递嬗至近现代的历程中,史学的经世功能呈现出从“资治”到救亡再至民族主义的演进脉络,其间隐含的即是通识性的趋向,或者说经历了从教化转向通识的过渡,其实也就是史学的经世取向从满足社会上层的传统单一政治诉求,蜕变为服务全体民众的多元文化需要。而通过反思和回顾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性转换历程,深入挖掘史学的通识性意义,在精神层面提升中国文化自信,以从容应对个人精神境界要求的持续提高、科技竞争的加剧、全球化浪潮的高涨、人类面临共同困境的困扰等诸多挑战,显然是中国史学在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路途中充分彰显其价值的必要手段。

一、中国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及其表现

根植于中国近代以前特殊社会土壤的传统史学,承载着特定的功能,传统史家、政治家的言论对此屡有触及。司马迁从认识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将之归纳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在气势恢宏的论述之外,亦不乏具体而微的阐发。相较于“居今识古”^①“大矣哉”^②局限于史籍价值层面判断的论调,中唐史家刘知幾对史学功能的概括无疑更为明确全面:“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③这是中古代表性史家对于史学社会价值的总体评价,其前提是史籍的“切合当时人事”^④。并且,直到近代,史学的社会功能仍然受到大力推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⑤的论断即为其证。

缘于“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⑥的性质,中国传统史学自其产生之初就已确立经世的路向。不过,作为一种与政治、经济互动的社会文化力量,传统史学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属性,又决定了史学往往以政治附庸的面貌出现,“资治”亦即“维系和重塑一个理想和道德的社会”^⑦的宗旨始终如一。而在“有资治道”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史学中一以贯之的鉴戒观念和褒贬意识,则是其中至为关键性的支撑力量,两者世代相承,并大致在史学迈进近代门槛之前趋于式微。

从中国传统史学经世思潮的产生来说,至迟萌生于西周时期的鉴戒观念,系其原初表现形态。^⑧《尚书·周书》反复重申的“殷鉴”立场,如《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君奭》“予监于殷丧大否”,《酒诰》“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等;《诗经·大雅》一再宣扬的“殷鉴”意识,如《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雅·文王》“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等,实则是秦汉以降史坛长期盛行的鉴戒史观之滥觞。

在鉴戒观念明确历史考察对象的基础之上,应运而生的褒贬意识又对历史内容的书写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孔子改写鲁史旧文,“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

① 《史传》,(南朝梁)刘勰著,韩泉欣校注:《文心雕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② (唐)唐太宗:《修晋书诏》,载(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③ 《史官建置》,(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④ 《浙东学术》,(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4页。

⑤ 《尊史》,(清)龚自清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⑥ 《浙东学术》,(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524页。

⑦ 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8页。

⑧ 庞天佑:《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第84页。

在片言,诛深斧钺”^①,采用褒贬的方式评价历史人物,其结果是“乱臣贼子惧”^②。肇始于孔子纂修《春秋》所开创的这种褒贬风格,由此被确立为历史编纂学的基本原则,加之善恶评判又服从于鉴戒的要旨,两者合而为一,史家的“笔削之任”遂定位于“申褒贬之微旨,为劝戒之大法”。^③

鉴戒观念重在总结过去得失成败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以作为指导当前和未来处世行事的根本原则;与之相表里的褒贬取向,则以评价人物善恶与否为中心,以规范人们的言行为宗旨。而无论是“以史为鉴”还是褒贬善恶,实际上都包含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和目的性。正是在此意义上,鉴戒和褒贬观念的交织,共同构成中国传统经世史学的早期内核。并且,以鉴戒和褒贬为基本特色的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风格,又在其初期通过教育手段而传承,并因此而不断强化,从而使史学“资治”的目的通过教化功能而实现转化。或者说,教化是中国传统史学“资治”功能的外显方式,史学的经世作用首先外在表现为教化功能。

之所以说教化功能是中国传统史学经世功用的转换环节,原因在于:从鉴戒角度分析,比照的主要是历史记载中的人物言论和事件,了解并反思上述内容,对于现实人生不无启迪,其间的道理正如《易·大畜》所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而鉴戒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教化、自我训诫的理念;再就褒贬而论,“儒家褒贬与善善恶恶,虽然与完全忠实记录之间有些矛盾,但并不是要使历史成为道德的教条,而是仍然要尽量书写真实的历史,作为道德与治乱的教训”^④,故而褒贬本身与真实的历史,其实都寓含道德诫勉与治乱教训的意味。因此,教化功能是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方式的说法,从理论上来说大致不差。

深入史学内部考察可知,春秋伊始,中国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就已有所凸显。《国语·晋语七》载晋叔向(羊舌肸)“习于《春秋》……使傅太子”,韦昭注:“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楚语上》又载楚庄公问申叔时傅太子之道,后者云:“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可见晋叔向和楚申叔时“傅太子”都与《春秋》有关。而《春秋》类史书在当时被作为教导太子的教材使用,其实就与内容上的“纪人事之善恶”有利于实现“耸善抑恶”“戒劝其心”的目的存在密切关系。

并且,先秦时期所开创的以鉴戒和褒贬为核心内容的史学教化功能,还被视为传统史学的根本任务,刘知幾即说:“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⑤由此而引申,“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鉴戒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⑥,即史官的根本职责是“慎言行,示劝戒”^⑦。换言之,史学意义的呈现,有赖于史官选择事件所秉持的鉴戒原则与评价人物的褒贬取向。因此,在史官优劣的评判上,刘知幾以“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⑧为一流史家的标准,执守的还是“彰善贬恶”的立场。

史学教化功能的鉴戒和褒贬特色,在历史撰述中也有清晰反映。典型者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其意图就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

① 《史传》,(南朝梁)刘勰著,韩泉欣校注:《文心雕龙》,第79页。

② 《孟子·滕文公下》,(清)阮元刻校:《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5页。

③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44—6645页。

④ 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93页。

⑤ 《辨职》,(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第179页。

⑥ (唐)令狐德棻:《周书》卷三《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⑦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第6643页。

⑧ 《辨职》,(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第261—262页。

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①。对于《资治通鉴》蕴藏的历史教化功能,宋末元初史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有所揭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②

更重要的是,史学的教化功能得到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普遍重视,乃至成为帝王之学的核心内容。唐高祖修史的目的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③。唐太宗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④。宋太宗曾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⑤又说:“朕颇读书,见前代治乱,岂不在心!”^⑥宋真宗认为:“经史之文,有国家之龟鉴。”^⑦而明清帝王为防止宦官专权,极为注意吸取前代教训,明太祖朱元璋曾谕吏部:“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⑧清顺治帝也对宦官“任使失宜”的后果有所警戒:“如明之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辈,专权擅政,陷害忠良,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煽党颂功,谋为不轨,覆败相寻,深可鉴戒。”^⑨而且,帝王的经筵讲读和东宫教育,也有意识地选择史著和史事作为传习内容。如宋钦宗为皇储时,曾系统阅读《前汉书》和《后汉书》。^⑩宋孝宗“每览《通鉴》,凡前事废兴、人才邪正,必亲题其要或为赞论箴诗寓褒贬之法”,并认为“《通鉴》,万世不刊之书,于人主尤切”。^⑪元武宗在位期间,王结“集历代君臣行事善恶可为鉴戒者,日陈于前”^⑫以教导太子。历代统治者对史学教化功能的极度重视,由此不难窥其一斑。

此外,各种官私教育中也包含大量历史知识的传授,从而使史学的教化功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如古代蒙学教材中的历史类教材占有不小比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古代蒙学教材总计约1500种,历史类大概有300种,其中还不包括含有历史叙述如《三字经》类的综合性教材,而且叙述一人一事的故事、图画之类的读物也未计算在内。^⑬各级各类官学中的经学教育,本身就包含不少历史的内容,书院的教学也大致与之类似。并且,唐宋时期科举科目的设置与考试内容中注重经史的倾向,也有强化史学教化功能的作用。

与之相应的是,在唐五代演史类变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宋代讲史,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主要素材的表演方式,简明直白,通俗易懂,受宋代商品经济渐趋繁荣和市民阶层壮大的刺激,影响力急剧膨胀,深受民众喜爱,由此而使得史学的教化功能向社会大众普遍传播开来,并奠定了其后大众历史教育的基础。而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出现,又与宋代讲史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鲁迅就说:“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⑭正是借助上述史学传播方式的有力推动,史学的教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向民众灌输的作用,但其根本目的仍在于维护传统

① (宋)司马光:《传家集》卷一七《进〈资治通鉴〉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2—183页。

② (元)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8页。

③ (唐)唐高祖:《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一,第466页。

④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四《国史部·恩奖》,第6657页。

⑤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六《祖宗圣训·太宗皇帝》,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454页。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九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20页。

⑦ (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三《圣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页。

⑧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太祖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页。

⑨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世祖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页。

⑩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547页。

⑪ (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六《建炎通鉴解义》,南京:广陵书社,2007年,第529页。

⑫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七八《王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44页。

⑬ 徐梓:《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54页。

⑭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

的王朝统治。

二、中国传统史学近现代嬗变中的理念更新

中国传统史学的行程,止步于鸦片战争导致的近代社会大变局。近代中国的深刻时代变迁,则是塑造被推进近代门槛的中国史学风格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之际,史学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并以救亡图强为主题。其后民国时期的史学即以此为雏形,并进一步深化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史学理念,其意图依然是使中国克服亡国灭种的风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导了史学研究的开展,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而从事的各项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突破,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进程。从学术自身内在的发展理路审视上述转变,史观进化在其间的作用不容小视。

中国近代史学发轫于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坚船利炮轰开紧锁的国门,中华民族遭受列强野蛮侵略的严酷现实,激发了晚清士人对于亡国之痛的深刻反思,而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又使有识之士将探究的目光投向西方科技和学术。当学术被引入到社会层面的思考之时,史学也由崇尚纯学术的考据而走向直面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从而前所未有地加深了与时代、社会的关联程度,整个晚清史学都贯穿着强烈要求变革、救亡图强的时代主线。

在晚清知识分子中,龚自珍率先冲破传统观念束缚而将史学导入应对时代危机的探索中来。他明确提出史学具有“忧天下”“探世变”^①的作用,强调史学与国家、现实人生的密切关系:“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②其宗旨在于使史学直面现实生活,以为社会危机提供化解之道,这在中国陈旧的思想界掀起了层层波澜,直接促动了知识阶层的思想解放。即如梁启超之评价:“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③

经由龚自珍发动的思想解放的狂澜,使史学气象为之一新,历史著述中的时代气息骤然增多,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夏燮《中西纪事》、何秋涛《朔方备乘》和黄遵宪《日本国志》等都体现出史学在近代化进程中救亡图存的学术取向。而且,伴随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中国学人在社会变迁的阶段划分上,显现出糅合公羊学家“三世说”和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端倪,如龚自珍“治世—衰世—乱世”说、王韬“上古—中古—三代”说、郑观应“弋猎—耕牧—格致”说等皆为其表现。而康有为的新“三世说”则更加突出西方化色彩,其核心内容即据乱世的君主专制、升平世的君主立宪和太平世的民主共和,取资于近代西方的政治话语,以改造公羊学家的三阶段论;而历史进化论由于解释了世界局势的变迁和西方的兴起,故而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宣扬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其目的仍在于救亡图存。

受上述史学经世思潮和历史演进观念的双重推动,中国史学的历史观也迎来了实质性突破,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进步,其具体表现则是从古代历史思想积极成果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过渡到近代进化论,又从现代进化论发展到唯物史观。^④与循环、落伍的历史观相比,进化史观是一大进步;与进化史观相较,唯物史观又是一大进步。^⑤当然,以上转变的实质性内涵存在根

①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清)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第7页。

② 《古史钩沉论二》,(清)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第22页。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④ 瞿林东:《中国现代史学思潮序》,载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⑤ 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5页。

本差别,“传统时代流行的是强调宿命、神意、正统价值观的传统史观,启蒙时代以后,理性主义潮流下‘进步的整体史观’逐渐兴起,它强调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可解释与可理解性乃至可预期性,其说包括价值理性的善(‘进步’)和恶(‘反动’或‘落后’)判断,以及工具理性的‘客观规律’论或‘科学历史观’。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演进史观是典型的两者结合:它既有‘进步’优于‘落后’的强烈价值取向,又相信‘进步’取代‘落后’是一种物理学式的客观进程。”^①其间阶段性的进步乃是不争之事实。

从源头上追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观的转变,发源于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严氏在综合、创造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基础上,认为人类的进化同样遵循生物进化的“物竞天择”法则,以此激励处在民族危急关头的中国人“自强保种”。1902年,提出“史界革命”口号的梁启超高扬进化史观,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②,“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③,并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阶段。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采用进化史观叙述中国历史的代表性史学著作。正是在上述学者的积极倡导下,由中外史学观念熔铸而成的进化史观,引领了其时的史学风尚。

在进化史观风靡一时之际,史学上升为学术救亡的思想利器。梁启超以其卓识精辟地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④充分肯定史学在培养爱国精神、增强民族意识方面的显著效用。并且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⑤这种在进化史观指导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精神的新史学思潮,为史学与时代的接轨开辟了新路,也为史学在现实中发挥经世功能创造出了新的范式。

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夕史学的主要任务,还是动员民众进行革命以推翻清政府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话,那么接踵而至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使思想主流中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给史学注入启蒙与理性的元素,并导致了融通中西史学实证方法的新历史考证学的产生。在此前后,多种西方史学观念涌入中国史学界,并形成众多史学流派。而至为重要的是,唯物主义史观也随之被介绍和积极宣传,并于20世纪20—40年代建立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尽管民国史学流派纷呈,各种思潮竞擅胜场,但无一例外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精神,故而其时史学“最大的情结便是‘救国保种’,或者说如何使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步入现代化,这只要观察一代新史家崛起的动因,便不难明了。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最早都在中国‘亡与不亡’的心理刺激下,或先或后地走上史学一路”^⑥,包括梁启超、王国维、陈垣、刘师培、吕思勉、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等概莫能外。即便并非专擅史学的章太炎,1924年所撰《清建国别记》“具有坚实的史学基础,以信史为追求的目标,以进步发展为史观”^⑦,也鲜明地展现出民族主义史学的特征,同样为中国史学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做出了积极贡献。

相较而言,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和深远。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

① 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6页。

② 梁启超:《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2页。

③ 梁启超:《新史学》,第94页。

④ 梁启超:《新史学》,第85页。

⑤ 梁启超:《新史学》,第91页。

⑥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58页。

⑦ 汪荣祖:《史学九章》,第147页。

蔡和森、瞿秋白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都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进行传播和研究,其中大量涉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分析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容,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迭经数年努力,终于初步构建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体系和话语系统。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研究,更多着眼于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重点在于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因而对中国社会改造的效果更为显著,史学的经世作用也体现得更加充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20世纪后半期史学研究流派的两个重要典型,与年鉴学派类似,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十分强调“从社会的因果关系中去观察历史现象。一个反映了对于历史现实发展的连续性的信念破灭,同时在寻求建立一个只研究以前历史的人类学;另一个则集中于对现实的改造”^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主要围绕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虽然有时不免存在教条化甚至“左”的倾向,但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的突破和所形成的丰硕成果有目共睹。

改革开放后,史学研究一方面纠正此前的错误方式,另一方面受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现实社会冲击下世界范围内史学观念新变化的影响,历史编纂学“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居民中的其他部分,从巨大的非个人的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的方面,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②。史学的研究领域拓展至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军事史和民族史等众多方面,而且中外史学交流愈益频繁和深入。正是得益于多重因素的推动,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史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史学在新时期致力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中国现代史学的通识性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从根本上看,史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人的学问。百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对此已有认识:史学的历史考察,“乃专就人事而研究其生成变化者。……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③。这种看法洞悉了历史学的底蕴和性质,与近现代西方学者对于史学的理解若合符契。西班牙思想家奥特加·伽赛特就曾说:“历史学是关于那种根本性的现实——我的生命——的有体系的科学。”^④英国学者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⑤。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指出,“历史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其他人类、其他社会如何。……历史工作不仅仅是理解事件,而是理解人,理解过去的人与我们是不一样的”^⑥。英国史家沃尔什的看法是,构成历史学全部思维基础的一套判断“关系着人性;它们是对人类在他

① [美]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陈海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②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③ 李守常:《史学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5页。

④ [西班牙]奥特加·伽赛特:《历史是一个体系》,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8页。

⑤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8页。

⑥ [法]雷蒙·阿隆著,[法]西尔维·梅祖尔编注:《论治史》,冯学俊、吴泓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67页。

们生活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挑战所做出的特殊反应的判断”^①。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也说:“历史学处理的乃是表现为创造了历史的男男女女们的意愿以及使社会得以凝聚的种种价值和风尚。历史学处理的是处在时间之中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文化。”^②凡此种种,强调的都是史学对于人类认识自身的重要意义。

并且,史学在探讨人类自身历史之时,往往将重心落实到人性问题的思考上。柯林伍德即认为,“要由人性科学来做的工作,实际上是要由、而且只能由历史学家来做的;历史学就是人性科学所自命的那种东西”^③。美国哲学家雷克斯·马丁对此也有阐述:“人性,即作为思想的心灵的自然状态,具有历史性的本质而且完全包括在历史的演变与发展的过程中。”^④中国当代学人对史学的人性特点也有深刻理解,明清史学家王家范先生尝道:“史家假若没有了对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关怀,没有了对人性的深刻反省,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历史的沉重拖到海底,再也浮不到海面上,向世人说清楚:大海的故事究竟精彩在哪里?”^⑤就此而言,人性问题的讨论是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占据核心的地位。

正是因为史学所研究的历史关乎人类自身的认识与人性的反省,所以其经世功能通常性地与人的道德修养乃至与家国情怀、民族信仰紧密相联,甚至藉此而表现。在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进程中,史学就曾经历从教化转向救亡图存再过渡到民族主义立场,继而演进为强调本土化话语体系形态的过程。不过,以上转变的前后观念之间,并非毫无关联,实际上有其共同基础。余英时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褒贬之前提即人具有自由意志,故可以并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认个人有意志自由乃是近代人文主义的历史哲学中的重要一环,亦是否定各式各样的历史决定论之基本论据之一”^⑥。换言之,史学的经世功能奠基于自由意志,而这是近代人文主义的基本组成要素,其实也是史学服务人生和社会的根源所在。有鉴于此,倘若转换思维视角,从知识接受与价值观改造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以来史学的经世功能,无疑具有普遍的通识性意义。而且,史学的这种通识性功能,在今天依然具有鲜活的时代价值。

宽泛意义上来说,当今时代,“科技已成为人类理解和改变世界的重要的知识根据,科学的精神更已与人文精神不可分割,而在社会越来越复杂的情形下,社会科学也变成人类了解和掌握本身命运所不可或缺的知识中的一环”^⑦。而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门类,对于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尤为紧要。原因即在于,“史学家的话语致力于认识,真实的认识”^⑧,而“如果没有历史学——也就是说,如果仅仅简单地从现在的状况对人类进行思考(因为现在毕竟只是过去投在未来之上的阴影),而不是从人类全部时代的各个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去对人类进行思考,社会科学就不完整。只有历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识能力”^⑨。这种认识能力对于人文精神的培养至为关键。

在知识层面上,“我们读史,可以得到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

① [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②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第1页。

③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第296页。

④ [美]雷克斯·马丁:《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断》,王晓红译,北京:天津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⑤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382页。

⑥ 余英时:《章实斋与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载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⑦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69页。

⑧ [法]雷蒙·阿隆著, [法]西尔维·梅祖尔编注:《论治史》,冯学俊、吴泓缈译,第103页。

⑨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42页。

的力量”^①;并且,“只有历史才提供了认识人类行为多元化的钥匙。一切与人有关的学科,如语言学、经济学、法理学、艺术和神学等等,都是历史的学科”^②。而直接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对于人类行为的分析更加专门和深入,在获取人类知识方面尤其集中有效。因此,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研究而形成的中国当代史学,所提供的对社会的理解和解读,无疑是人们了解当代中国的第一手材料,而这还只是史学在知识层面上的作用。

在价值观的锻造上,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对人生的态度影响极大,李大钊认为,“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这种求真的态度,薰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心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③,研究包括史学在内的学问,“乃是为人生修养上有所受用”^④。德国学者雅斯贝斯在回答研究历史的原因时也曾说过:“为什么要研究呢?因为人生是有涯的、不完全的,同时也是不可能完全的,所以他就必须通过时代的变迁才能领悟到永恒,这也是他达到永恒的唯一途径。”^⑤此语充分肯定了史学在塑造人生价值观方面的重大作用,当然这还是仅就个体而言,尚未涉及社会和国家的层面。

结合以上所述,再联系中国近现代史学相继以救亡图存、民族主义与民族特色为主题的发展来看,与社会紧密相联的史学,实际上承担着强化家国情怀意识与民族信仰的重任。如果说“国可灭,史不可灭”^⑥起初着重强调的还是保存历史事实的话,进入民国,其意义已经截然不同。1929年,陈寅恪即说:“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⑦其中更多的是对民族文化本位的执守,显示出的是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钱穆秉持文化保守主义,对历史培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作用,也有深入阐述:“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⑧这些从本土文化出发的论述,寓含强烈的民族主义特色。而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对自身民族精神的体认和崇奉,是多数人民信奉的最高原则,具有广泛的影响,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⑨

不仅如此,现代中国社会知识群体所习称的“‘西化’‘民族本位’以及‘中西会通’等等思想路径,实际上也都不同程度地转换为历史学家对本国史考量的‘话语’系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史学是从整体上反省和检讨中国全部历史,探索中国发展前途的现代思想运动的一部分”^⑩。而在中国现当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伴随中国化进程的加深,同样强调国家、民族特色。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道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⑪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高度重视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而且在和平建设时期也一再重申增强国家主人翁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性。

① 李守常:《史学要论》,第65页。

② [美]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陈海宏等译,第3页。

③ 李守常:《史学要论》,第132页。

④ 李守常:《史学要论》,第64页。

⑤ [德]卡尔·雅斯贝斯:《论历史的意义》,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53页。

⑥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72页。

⑦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62页。

⑧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页。

⑨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3—74页。

⑩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363页。

⑪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0页。

而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的维护,是每一个中国人最为基本的情感,史学的熏陶和学习有助于强化这种感情,其通识性意义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中国史学的当代通识意义还包括形成全球史观,并从整体上去把握世界潮流和人类发展趋势。这是因为,“当代史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区的历史。因此,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的诸种力量……对有关整个世界格局的各种传统看法和论断予以重新审视与修正”^①。同时,还应看到的是,“在尝试用新方法研究人类历史广泛的多元性时,当代历史学术已向更接近启蒙时代的思想迈出了一步,这一思想就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值得历史的理性研究”^②。因此,在全球一体化浪潮将世界各国日益紧密地联结为一个整体,并面临共同的生存困境和难题时,迫切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史学的理性精神去寻求破解之道,才能真正化解危机,造福于全人类。

四、余 论

中国史生生不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即道:“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③梁启超则说:“于今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④而之所以中国史学从传统到近现代一直传承不辍,其根源即在于史学始终能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并以不同的方式而致用,以至清晰地呈现从教化到救亡再到民族主义等的一系列转变。若从史学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角度考量,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实际上具有普遍性的通识意义,成为社会成员获取基础知识、坚持基本信仰的重要来源,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更是如此。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加深的当代社会,中国史学对于培养家国情怀、民族情结而言仍然必不可少,这是应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提。正如论者所言:“在这个空前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人民迈向未来的行程中,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精神,仍是史学工作者所应坚持的原则。”^⑤毕竟全球化格局无法取消民族利益,也不可能放弃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话语体系。与之相反,在全球化趋势下,各民族国家都在努力保持自身特色,延续民族传统的血脉传承,以求达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和谐统一。^⑥因此,重视和挖掘史学的通识功能,既是强化爱国感情、增强民族意识的重要途径,也是史学在新时代的感召下肩负的使命和义务,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最后,即使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考量,尽管历史被视为一种暂时性、不安定的和非本质主义的叙述,从而颠覆了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元叙事的旧有范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又是多元的、具有多个中心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并非史学的固有话语体系,世界各地或各民族本来都是平等的,彼此间的差异不容忽视,真正整体化的世界历史格局实际是包容多个文明进程的复杂图景。因此,在中国史研究范畴中,需要以中国而不是以西方为主导,并大力开展区域史与地方史研究,关注下层社会历史的挖掘,将多种方法与历史实际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⑦

照此而论,虽然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史研究否认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现代化叙事的主线,其史观

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② [美]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陈海宏等译,第17页。

③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④ 梁启超:《新史学》,第85页。

⑤ 瞿林东:《中国史学通论》,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270页。

⑥ 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

⑦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的主要任务就是力求切断进化史观人为构建的前后衔接的连续性解读策略,并将注意力转向于基层社会组织与日常生活的实际运作,着意梳理民众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反复张力关系,借以考察传统的功能,尽力破除线性史观强调连续性的制约。^①然而,无论是社会史侧重人的行动,新文化史强调人行动背后的文化逻辑或文化符码,还是女性史关注的身份差异、多元及流动,作为代表西方史学未来趋向的后现代主义史学都能一并将之揽入研究视野,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认识及其手段^②,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并在更大程度上关注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观念、历史记忆与话语表达。因此,在培养本土认同的情感方面,中国史研究的后现代主张同样具有通识化倾向,而此点与中国近现代史学功能的实质并无二致,两者在史学的民族主义价值认知上多有暗合之处。

Modern Transformations of Traditional Functions Concern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Zeng Yurong

Abstract: Humanistic pragmatism wa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owever,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 meaning of humanistic pragmatism concerning historiography varied greatly in different eras. The administrative aim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was to meet the political demands of the upper class, mainly through a top-down indoctrination function which employed persuasion and warning as well as praise and criticism as the core approaches. Stimulated by the deep national crisis caused by modern foreign aggression, historiography becam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destiny of the nation. Concomitantly, the traditional theme of education yielded to national survival and self-strengthening, and developed into nationalism, emphasizing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As such, historiography grew related to the realities of ordinary peoples' lives. In particular, th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closely linked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gradually formed a comprehensive Chinese framework and system, with the deepening of its Sinicization process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Nationalism was also connotated in its distinctive localization. In the social evolu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leaned towards general education. It improved the moral character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cultivated national beliefs, and aided a global historical view. Such influence has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its contemporary values.

Keywords: Chinese Historiography;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umanistic Pragmatism; Nationalism

【责任编辑:姜胜利】

① 杨念群:《“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第20—21页。

② 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6页。